

第 1 章

中国翻译史研究概述

本章关于中国翻译史研究综述在时间上分为 20 世纪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综述和 21 世纪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综述。20 世纪的中国翻译史研究部分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点，分为成立前和成立后两个时间段，前者以 1902 年为起始点；后者以地域划分为大陆（内地）、台湾与港澳三个部分，其中，大陆（内地）的翻译史研究以改革开放作为分界点，分段梳理各时期的翻译史研究情况。21 世纪以来的翻译史研究则划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分别进行梳理。

20 世纪的港澳台地区以及改革开放前的内地（大陆）的翻译史研究相对零散，因此主要以历时的方法进行梳理。内地（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因翻译史研究出现蓬勃发展势态，成果繁多，则将翻译史研究的文献分门别类进行论述。综述尽可能地涵盖港澳台与内地（大陆）的翻译史研究情况，但因港澳台地区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成果较少，下半叶的成果相对较多，因此将其整个纳入 20 世纪下半叶的编排中。进入 21 世纪后，港澳台与内地（大陆）交流频繁，比如同一本书在大陆和台湾由不同出版社先后出版，要将此书划分给其中一个地域显然并不合适，因此将港澳台与内地（大陆）的翻译史研究情况也综合进行分类梳理，不再做地域的划分。

综述尽可能全面地涵盖 20 世纪以来出版的翻译史研究成果，所参考的翻译史研究资料以正式出版的著作为主，这类翻译史研究资料有一定的系统性，能够针对某一论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翻译史研究资料较少的时期，例如 20 世纪初期，综述也列入了翻译史研究的相关论文；某些著作虽然并非翻译史研究的专门作品，

但其中论及较多篇幅的翻译史，或者书中涉及针对某个特殊对象的翻译史研究的专门论文，因此也被纳入本综述当中。翻译史研究的著作可依据多种方法进行分门别类，本章对翻译史研究进行分类梳理的部分中，主要是依据各翻译史研究资料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或范畴进行划分，具体分为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实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许钧，2018：180）、翻译史、译学理论和翻译思想史、翻译出版传播史、翻译教学史、断代翻译史、民族和区域翻译史、以译作为中心的翻译史、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翻译史研究论文集、汉籍外译史、翻译通史与史略、翻译史相关资料编纂、通史和其他专题研究等。这些类别之间的界限并非完全清晰，某些类别可涵盖的内容有交叉的部分，因此有些翻译史著作可划分在多个类别之下。鉴于此，本章视情况只将其归于某一类翻译史研究之下，不再纳入其他类别之中。同一类别中的翻译史研究文献主要以时间先后顺序进行介绍，对同年出版的著作的罗列，顺序不分先后。

1.1 20 世纪的中国翻译史研究¹

1.1.1 20 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光绪二十八年（1902）载于《中外日报》的《译书略论》（佚名，2003：12）一文指出，以东汉时期的佛典翻译为起始，中国拥有悠久的译书传统。该文重点论述明朝之后的译书情况，并将明朝后的翻译活动分为四个时期，详述每个时期的所译之书属类、译书之人、译书之地、译书宗旨，甚至经费来源。虽然此文只有片段式的分析，但已摆脱传统感悟式的写法，“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明末至清末的西学翻译史做了历史时期的划分”，是“第一篇比较系统地讨论中国翻译史的论文”。（邹振环，2017：28-29）

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开始从现代学术的视角整理和研究佛典翻

1 该部分的内容，尤其 20 世纪上半叶的翻译史部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翻译史部分，重点参照了邹振环，《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上海：中西书局，2017，并以其为基础补充史料。

译文献，其中与佛典翻译史直接关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篇文章：一为《佛典之翻译》（1923），另一文为《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翻译文学与佛典）》（1921）¹。前者详细考察了东汉至隋唐年间约七百年（公元67—789年）的佛典翻译事业，并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即东汉至西晋之“启蒙”期，两晋至南北朝之“骤盛”期，唐贞观至贞元之“全盛”期。每个时期述其时代背景、译经代表人物、译经方法特点等，最后提及译经活动因几次灭法灭佛历史事件而致衰落。唐贞元年（公元785）后约两百年间译业中止，到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往后五十多年间译场再兴，但此时的译经影响及质量都难及前期。《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翻译文学与佛典）》分“佛教输入以前之古代翻译文学”“佛典翻译界之代表人物”“翻译所据原本及译场组织”“翻译文体之讨论”“译学进步之影”“翻译文学之影响与一般文学”六个部分，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佛典翻译史的若干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翻译史研究有胡适所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其中的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为《佛教的翻译文学》上、下篇，包括了多篇对不同时期的佛典翻译活动，多位佛经翻译家、译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文章。蒋翼振编有《翻译学通论》（1927），其中收录了严复、梁启超、胡以鲁等多位学人论翻译问题的文章。谭正壁编著有《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该书中有三篇涉及翻译史的文章：《释典的翻译》《翻译文学上》《翻译文学下》。其中，《释典的翻译》一文简要梳理了中国古代佛典翻译史、翻译动机以及影响等方面的内容，另外两篇文章梳理了彼时汉译的十多个国家的书目及译者名。同年还有陈子展所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中的《翻译文学》一章论及了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史。

该时期涉足翻译史研究的学者还有郑振铎、贺麟与阿英。郑振铎在《小说月报》发表的《林琴南先生》（1924）和贺麟刊载于《东方杂志》的《严复的翻译》（1925）两篇文章开启了近代翻译家研究的序幕。郑振铎对清末翻译史也有整体的描述，如写有《清末翻译小说对新文学的影响》（1936）。阿英所著《晚清小说史》（1937）共14章，书中最后一章专门对晚清的翻译小说进行分类研究；另有用章回体小说编纂的近代中国的《翻译史话》（1938），但只有四回，后便搁置了。阿英在1941

1 梁文署名均为梁启超笔名“梁任公”。

年还写有《初期的翻译杂志》一文，介绍了五种专门刊载翻译文章的杂志。20世纪30年代与翻译史有关的，还有冯承钧编纂的《历代求法翻经录》（1931），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1933）和《中西交通史》（1934），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一书中第七章《翻译文学》梳理了清末民初的翻译史，寒光的《林琴南》（1935），郑伯奇著《两栖集：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1936）中的《清末的翻译小说》和《清末的翻译论争》二文。20世纪40年代有黄嘉德编纂的《翻译论集》（1940），该书是编者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翻译课程时所积累的材料，共四辑，分别为“翻译通论”“论译名”“论译诗”，以及“翻译的历史”。全书共20多篇文章，其中包括严复、林语堂、胡适、周作人、傅斯年、艾伟、鲁迅、曾虚白、陈西滢、吴稚晖、郭沫若、朱经农、吴挚甫、胡以鲁、容挺公、章行严、曾孟朴、成仿吾、刘半农、郑鹤声和郑鹤春等人对翻译的原理、方法、历史等方面的探讨。另外还有林榕的《晚清的翻译》（1943），李一鸣著《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43）中的第八章《翻译整理及其他》，罗根泽编著的《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1943）中的《佛经翻译论》一章，田禽《中国戏剧运动》（1944）中的《三十年来戏剧翻译之比较》，李季的《我国的翻译事业》（1946），周一良在《申报》上发表的《论佛典翻译文学》（1947，1948）一文，王宗炎的《古代的翻译》（1948a）、《求经与翻译》（1948b）等。

1930年郑鹤声、郑鹤春编纂的《中国文献学概要》注意到翻译在文献学中的地位，1944年由郑鹤声撰写的《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一文分期论述了清末以来的编译事业。周昌寿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1937）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早研究科学翻译史的成果”（邹振环，2017：50）。范行准著《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1943）涉及由西方传入中国之医学知识的梳理。另有通史类书籍如历史学家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32），将中国文化史分为三大时期，并用相当的篇幅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书活动。另在民国时期有几部译书目录形成，如由虚白编、蒲梢修订的《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1929），蒲梢编《中译俄小说编目》（1930），杨家骆的《民国以来出版新书总目提要》（1933），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筹备会编的《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年著译编目》（1941），戈宝权的《高尔基作品中译本编

目》(1947)及其续编(1948),吕叔湘编著《英华集:中诗英译比录》(1948),徐宗泽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1949)。

中国翻译史研究初期虽成果有限,但参与之人既有当时的大学者如梁启超、胡适,也有后来成名的各大家,如文学家郑振铎、哲学家贺麟、文献学家郑鹤声、历史学家柳诒徵、目录学家徐宗泽等,因此,是有着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

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20 世纪末

本小节将此时期的翻译史研究按地域分为大陆(内地)地区、台湾地区以及港澳地区,分别梳理各地翻译史研究状况。大陆(内地)地区的翻译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前后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将进一步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分别梳理前后两段时间的翻译史研究状况。

1. 大陆(内地)地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陆(内地)、台湾、香港受各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史研究方面形成各自的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成立出版总署翻译局,同年创刊《翻译通报》,1951年董秋斯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认为应该完成《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学》两部大书。1951年第二卷第五期和第三卷第一期的《翻译通报》均推出了“中国翻译史特辑”,邀约了包括叶恭绰、张建木、苏晋仁、余文、柏乐天(Prahlad Pradhan)、黄贤俊、漆侠、谢再善、季羨林、张孟闻、参话等一批学者,组织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翻译史的讨论,这些文章讨论的重点集中在佛经的翻译史,近代方面则主要集中在严复、林纾二人。1952年翻译界开始了“三反”运动,翻译史的文章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关于俄文的翻译及其讨论日趋热烈。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出现“史学革命”运动,其中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1957级学生编写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受到俄苏翻译史研究转向的影响,算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完

整的标明为《中国翻译文学简史》的著作”(邹振环, 2017: 82)。

进入 1957 年, 翻译史研究进入低潮期, 特别是 1966 年至 1976 年这十年中, 几乎完全停顿, 但这一时期在翻译出版史料的整理工作上仍有成就, 阿英和张静庐在此方面有相当大的贡献。阿英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致力于资料的整理工作, 关于翻译小说的成果有《晚清戏曲小说目》(1954)、《晚清文学丛钞: 小说戏曲研究卷》(1960)、《晚清文学丛钞: 俄罗斯文学译文卷》(1961)。这一时期另一位在出版史上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为张静庐。自 1949 年后, 张静庐广泛收集出版史料, 于 20 世纪 50 年代集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共七编八册 250 万字, 涵盖 1862 年至 1959 年近一百年的有关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其中包括了 1862 年京师同文馆的创立到 1949 年间的翻译出版的丰富史料。除此之外, 由伊凡·巴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著、戈绍龙译的《高级神经活动研究论文集》(1955)中有《关于苏联伊凡·巴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研究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及编译》一文。译家研究方面, 有沈鹏年所辑《鲁迅研究资料编目》(1958), 该书共三辑, 上辑是“鲁迅著译及有关书录”, 中辑为“有关鲁迅著译的一些原始资料目录”, 下辑是“关于鲁迅的研究资料系年目录”。上官艾明编著的《瞿秋白与文学》(1959)中论及瞿秋白对翻译工作的贡献。另外, 还有孔立所编的《林纾和林译小说》(1962)。佛典目录整理方面, 金陵刻经处出版了《玄奘法师译撰全集》(1957)。涉及《资本论》的翻译史的著作有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资本论〉研究论丛(第1辑)1949—1959》(1976)。

2) 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 中国翻译史迎来了有史以来成果最多的时期。翻译史资料汇编方面, 1983 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纂《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 选择了 30 余篇文章; 商务印书馆分别在 1981 年和 1982 年推出了论文集《林纾的翻译》和《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并配套出版了“林译小说丛书”和“严译名著丛刊”。1982 年有胡从经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涉及该时期的儿童文学的翻译史, 1983 年有薛绶之和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 较《林纾的翻译》

内容更加丰富。

邹振环(2017)认为1984年是中国的“翻译史”年,缘于此年涉及三件大事:一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翻译通讯》编辑部选编了《翻译研究论文集》(1984a, 1984b)共两集,第一集收入了1894—1948年历史上翻译理论的论文51篇,第二集收入1949—1983年译学论文63篇,选编内容较之刘靖之编《翻译论集》在晚清部分有拓展;二为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的问世,收集自汉末至编定日有关翻译的论文180余篇,该论集在2009年出版第一次修订版,在2016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该书自问世以来深受学界好评,其编者在长篇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提出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的主张;三为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该书涉及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两个传统,以及少数民族翻译活动,是一部贯通上下的简明中国翻译史,1998年该书出版增订本。除上述三件大事外,1984年还有戈宝权的《中国翻译的历史》,他晚年在《伊索寓言》等作品的翻译史研究上也有一定成就,该方面论文收入《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1992)一书中。对翻译史资料较为系统的整理,至今仍是学者不懈努力的事业。

翻译史的研究对象还应包括译者对于翻译事业的回忆,读者等对翻译事件的口述等直接翻译史料,以及翻译事件发生后译者追忆或补充的口述历史等间接史料。在翻译家自述、口述和访谈的出版方面,有1989年王寿兰主编的《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收录了104位翻译名家的翻译短论和简要自传和简历。1990年施蛰存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共三卷约190万字翻译文学史资料汇编,收录“五四运动”之前的外国文学译本,第一卷收入28本所谓“纯文学”译本的长篇小说,第二卷收入18种科幻、神怪和推理小说题材的长短篇通俗翻译小说,第三卷收入翻译文学中的散文、诗歌、散文诗、寓言、童话、莎士比亚剧本故事、天方夜谭和戏剧等类别译文。译名问题也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方面,1990年张启之、周祖达主编的《译名论集》,是结集的译名史资料的专题汇编。该论集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3篇论文,是关于译名和科技名词术语规范问题及统一术语的意义的总体论述;第二部分3篇论文,主要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

关于译名问题的讨论；第三部分 11 篇论文，为一般译名和科技译名的讨论；第四部分 14 篇文章，主要是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律学和体育学的译名问题；第五部分 12 篇文章，涉及统一译名的原则、意义、方法和建议等。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末这段时期，中国翻译史研究在史料整理和研究的开拓上有着突出的成就。

在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方面，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完整标明“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著作。该书将 1840 年到 1966 年间的中国翻译文学的演变划分为五编，分别为第一编“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第二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初期（从 1915 年新青年社到 1930 年‘左联’成立）”，第三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中期（从 1930 年‘左联’成立到 1937 年抗战开始）”，第四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后期（从 1937 年抗战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五编“中国当代翻译文学（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66 年）”，每一编都对每个时期的相关翻译活动、翻译机构、译者进行了讨论。田本相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1993）基于比较文学视角，从中外话剧运动、理论思潮和创作的关系来阐述中国话剧的诞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说明中国话剧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分上、下篇编排，上篇为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特点，下篇讨论近代以来主要的翻译家，该书 2005 年出修订本。赵光育的《中国翻译小说史论》（1999），分“近代编”“现代编”“当代编”三编，每编分成三个时期，是专门讨论中国近现代翻译小说的专著。

在实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翻译史料的整理方面，有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的《〈资本论〉研究论丛（第 4 辑）1966—1979》（1980），其中涉及《资本论》的翻译史。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1983），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相关作品的翻译史；在这方面另有高军等主编的《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1986）。该时期有突出贡献的是黎难秋，他首先编纂了《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1993），所收文献时间段在 1911 年到 1949 年；后

与李亚舒合编了《中国科学翻译史料》(1996),该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叙述汉晋至清末科技文献的通史,中篇分学科介绍相关知识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其作用,下篇为科学文献的影响。这方面还有黄见德著《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1998),上编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历程和问题”,下编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反思”,上编中涉及20世纪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史。

在译学理论和翻译思想史方面,1992年陈福康出版了《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并于2000年出修订本。该书集结了翻译家和其他学者关于翻译的理论或者言说,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杜承南、文军主编的《中国当代翻译百论》(1994)也是集多家之言的译论集萃。严复的翻译理论在20世纪占据了长时间的讨论空间。沈苏儒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1998),主要考察了严复翻译理论在中国译学史上的地位,指出严复的翻译理论依其本身的价值意义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1999)也通过解读严复的翻译理论来解读中国的翻译理论史或者翻译思想史,指出翻译史研究应改变“原著中心论”的方法,以更高的眼界来关照翻译史的研究。

在翻译出版传播史方面,最早将“翻译出版”作为一个整词进行理论阐释的是李景端(邹振环,2017:259)。此外,邹振环的《江苏翻译出版史略》(1998),讨论了江苏地区自古至20世纪30年代的翻译出版史。

在翻译教学史方面,关于中国翻译教学的研究,有三部著作涉及同文三馆及其翻译教学史——付克的《中国外语教育史》(1986)、李良佑等编著的《中国英语教学史》(1988)、张正东的《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2000)。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1994)有多处讨论教会大学中的翻译教学。有关1949年后的翻译教学史,有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编纂的《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1949—1989)》(1993)和穆雷的《中国翻译教学研究》(1999),后者梳理了中国翻译教学历史,并分析各个时期的特点。在翻译教材的编纂方面,有张美芳199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大陆翻译教科书发展研究》,修订后于2001年以《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为题出版,书中对

此阶段出版的英汉翻译教材作了细致的归纳分析。

在断代翻译史研究方面，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94）涉及部分翻译史料，孙致礼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96）分三篇分别介绍了中国1949年到1966年间出版的460种英美文学译作、涉及的译者研究以及这17年的翻译史带来的经验和启示。断代史研究还有周子东等编著的《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1994），卜立德（David Edward Pollard）主编的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1998），另有陈应年和徐式谷《哲学社会科学翻译的回顾与现状》（1992）一文回顾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间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史。讨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翻译史的文章有叶水夫的《大陆改革开放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1994），以及王晓明的《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80年代的翻译运动》（1998）研究报告。

在民族翻译史和区域翻译史方面，史金波著《西夏佛教史略》（1988）涉及西夏文佛典的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牙孜主编的《西域翻译史》（1994）是一部以区域方法来考察翻译活动的著作，该书将西域翻译史分为五个阶段：古代、东汉至隋、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清代，分述每个阶段的翻译活动和基本特征。其后陈世明的《新疆现代翻译史》（1999），描绘了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疆地区的翻译活动情况。

在以译作（指外文书籍中译作品）为中心的翻译史方面，代表作品有袁锦翔的《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1990），该书讨论了多个译者多种译本的翻译情况。邹振环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1996），以译作为中心建构晚明以来的西书中译史，该书2008年出版修订本。胡培兆、林圃的《〈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1985），是以《资本论》为中心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涉及《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类似的还有雍桂良著《〈资本论〉的写作与传播》（1982）。以译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曹鹤龙的《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1995）。

在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中国佛教协